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九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七期 ——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9a）

|        |                 |     |
|--------|-----------------|-----|
| 【往事追忆】 | 北航文革之初          | 戴维堤 |
| 【难忘岁月】 | 走进文革            | 梁守福 |
| 【史海钩沉】 | 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与北上告状 | 何 蜀 |
| 【抗拒遗忘】 | 又逢“八一八”         | 顾训中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往事追忆】

北航文革之初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作者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在文革开始时为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学生，是该校最早反对文革初期由国防科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的人士之一，从而成为后来北京高校中有名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导人。〕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对共产党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种天然的崇拜。随着世界观的逐步形成，这种朴素的感情得了升级和升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必胜充满了信心。这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从小铭记在心。我崇拜马克思、崇拜列宁、崇拜毛泽东，崇拜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屈原、杜甫、李白、岳飞、文天祥和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以及外国的保尔·柯察金、牛氓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当时那个年代，象我这样的热血青年大有人在。

象我这样的人，任何运动都不会当逍遥派。

1966年上半年，我对报纸上关于“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大讨论十分感兴趣。晚自习时，我常跑到图书馆去看报。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当时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和斗争一无所知，但我感到报刊上的讨论很有意思。令我不解的是，许多文章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大帽子压人。特别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太霸道，写的文章不讲道理。他使我想起了反右派时那些积极分子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一种打抱不平的心理指使我，写了一篇短文，投给了《人民日报》，文中对姚文元等人不客气地进行了抨击。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任何背景，也不知姚文元是何许人也，纯粹就事论事地参与了这场讨论。谢天谢地，我当时用的是化名。事后才知，由于这场讨论事关大事大非，所有投稿皆存了档备查，幸亏我用了化名。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火。不知为什么，全国象洒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烧了起来。谁都知道，下令点火者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不久，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乱了，停课了。学生们都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后便向院党委开了火。

据我回忆，北航最早给党委提意见、“炮轰”党委的主要是一批高干子弟，这不奇怪。北航工农子弟多，见识少，没有小道消息来源，只能听党中央号召和《人民日报》社论的。高干子女见识广，消息灵，胆子大，所以先行一步。

平心而论，当时高干子女们也好，工农子弟们也好，教职工们也好，对党委、院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全是好意，提的意见也不疼不痒，不外乎学生负担过重啦，工农子弟受排挤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啦，某领导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啦等等，还没有人上纲上线，要打倒谁，“砸烂”谁。

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知内情的干部和教职工的揭发批判，全院开始乱了起来，党委已经瘫痪。北航主管上级国防科委按中央指示派来了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

#### ◇ 反工作组的斗争

工作组一进院，便取代了党委，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长赵如璋“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象其它学校一样号召全院师生揭院党委的盖子。很快，工作组便罢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官，让群众揭发、批判，带高帽子游街。不久，以沈元副院长为首的一批航空专家、教授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受到了打击、迫害。

高干子女们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事实上是对着他们的老子们来的。他们在积极炮轰北航党委、批斗北航老干部的同时，他们的老革命老子们在全国各地也开始被批斗、打倒了。因此，随着运动的深入，高干子女们开始消极起来。他们开始保工作组，对工作组唯命是从，不愿再造反，有的人当起了逍遥派，洗手不干了。

我没有老子了，但作为烈士的后代，作为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为了防止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仍然积极地投入到了斗争中去。我和一些学生受到了工作组的赏识，成了文革积极分子和工作组的“红人”，被指定为基层“文革代表”。

实事求是地说，在揭批北航党委盖子的过程中，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因为本人实在不知道党委主要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在工作组的领导和支持下，本人和许多同学一样，写过几篇不疼不痒的大字报，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没有具体针对党委的任何一个人。对基层党支部普遍存在的发展“老好人”入党的做法，本人写大字报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

工作组取代党委以后，许多领导干部和教授都被打成了“黑帮”和“牛鬼蛇神”。这时，工作组又提出了“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的错误口号，把矛盾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

而我和许多学生们（以工农子弟和一般干部子弟为主）认为，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号召“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是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大方向肯定错了，为什么不能对工作组提意见呢？

这时，同班同学石兴国先行一步，贴出了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矛头指向了工作组和上面。一石激起千层浪，北航顿时象炸了锅一样，支持的，反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工作组如临大敌，立即组织人马批判，围攻。

我对工作组的作法也很不满。我认为工作组矛头指向学生和一般干部、教师，大方向错了。石兴国同学的大字报，是根据中央社论精神写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在“5·16通知”里那些惊心动魄的话）。走资派无论地位多高职务多大，只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一追到底，把他们拉下马，所以，石兴国同学的观点没有错。于是，我和其它同学立即写了支持的大字报。由于3511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支持我们，所以3511班以反工作组最厉害在全院出了名。工作组立即组织人马对3511班进行批判、斗争。

工作组的做法，令我们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出了北航“赶走工作组”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鉴于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大方向错了。赵如璋同志已不适宜继续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议国防科领导另派负责同志。”当时，我的真实思想是针对赵如璋个人的，我当时对国防科委领导仍是拥护的，但是，大字报一出来，我便有口难辩了。

我的大字报顿时成了众矢之的。

“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维堤的嚣张气焰！”“揪出反革命分子戴维堤示众！”……顿时，全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对准了我。由于我是“文革代表”，许多人要求工作组立即罢掉我这个“代表”的“官”。我不甘示弱，又贴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了‘官’也要干革命！”的大字报。这时恰好工作组刚罢免了王恒、周天行的党委正、副书记的官，于是我又多了一条为黑帮分子“喊冤叫屈，助威打气”的罪名。工作组如临大敌，一面派人调查我的出身、家庭、表现、同“黑帮分子”的关系，一面组织人马批判、围攻我和石兴国等人，这就是北航文革初期有名的“六·二七大辩论”事件。

1966年6月27日这天，我被许多人轮番批判、围攻一直到深夜，我“困兽犹斗”，被迫自卫，顾不得说话“结巴”，声嘶力竭地同众人辩论、争吵，一直到口干舌燥，声带失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没有武斗，没人打我，只有些推推拉拉而已。天快亮的时候，同班同学把我架回了宿舍。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出现了奇迹，同学们突然发现我说话不结巴了。啊！真的，

困扰我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间没有了。谢天谢地，这真是福从天降，因祸得福也！从这点上，我真感谢工作组和批判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他们治好了我多年的口吃毛病。（注：从那以后，我的讲话能力和口才逐渐好起来。如今“吹起牛”来，可谓口若悬河，走向了反面。）

在工作组的指使下，我和石兴国等3511班的同学们被轮番批判。以孔令华为首的四零五教研室和以陈忠为首的五零一教研室的老师们水平不凡，他们有理论，会分析，能上纲上线，极具说服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工作组代表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在1957年就要定为右派分子。现在承认错误，可以从宽处理。党和国家培养你们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戴维堤是烈士后代，你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和革命家庭，如不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出于对老师们的尊重，加上当时确实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我们不得不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心里是不服气的。当时没有如今的口才，否则很可能老师们会甘拜下风，因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这位孔令华老师，非一般人物。他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李敏的丈夫，毛泽东的女婿，后来当了院文革筹委会主任。他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的。他当时与我们对立得很厉害，批判我们时十分卖力，我本人也同他辩论过多次。他虽同我们观点相左，但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从人格上始终十分尊重他。

据多年后李敏同志在回忆录中说，孔令华曾受到过北航红旗的迫害，被批斗时坐过“飞机”，并被诬蔑为“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李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竭力表白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受害者，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且不说当年孔令华同志为首的文革筹委会对我们的批判和打击是何等厉害——而这些我们早已哈哈一笑置之。据我所知，北航红旗“翻身”以后，对工作组和继承者——文革筹委会主任孔令华确实进行过批判，至于是否坐过“飞机”，笔者印象已不深了，即使有，也是当时北航四系的一些学生们干的，与韩爱晶等人和笔者无关。这笔糊涂账希望李敏同志还是不要再计较了吧！李敏同志不了解的是，后来韩爱晶和我们曾经多次想邀请孔令华参加北航革委会领导班子，韩爱晶多次想把革委会主任位子让于孔令华，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多年以后，孔令华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聚会，无话不谈。这些事孔令华可能瞒着李敏，否则为什么李敏同志不知道呢？由于多种原因，孔令华后来被调离北航，进入军界，但仕途不顺，后步入商界。1999年他在深圳出车祸，不幸身亡，我们知道后无比悲痛，有的人专程去深圳向他告别，我们至今非常怀念他。李敏同志如能看到此书，请不要再骂我们。至于本书中对毛泽东主席文革中某些失误的评述，请李敏同志谅解。毛泽东首先是属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我们决不全盘否定毛泽东主席，我们对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永远哀悼和怀念。

陈忠老师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当时是五零一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文革初，他的许多亲友都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冲击，他也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他同我们观点对立得很厉害。他批判过我们，我们也批判过他。后来，文革中的事一笑置之，我们和陈忠老师握手言欢，成了好朋友，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毕业后我和同学们常去看望他。他后来任北航党委书记，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现已离休。我借本书祝陈忠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对本书的某些观点，陈忠老师可能有不同看法，请他谅解吧！

#### ◇ 写血书

书归正传。北航“6·27”大辩论后，我和许多学生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牛鬼蛇神”，强迫接受批判，被责令检查交代问题。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抗美援朝”大会，全院师生都参加了，我和“牛鬼蛇神”们被工作组派人看管了起来，剥夺了政治权力和人

身自由。

一天晚上，我站在北航六系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孤儿，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了呢？不就是给工作组提了几个意见吗？提点意见就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逻辑？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不出修下主义，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给工作组提点意见，有什么错？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些情况不？我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要自己救自己。于是，我割破了手指，写了一份血书：“誓死忠于党，誓死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并连夜写了万言书大字报，公布了我的家史，呼吁工作组和全院师生不要把矛头对准我。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了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同志的办公室门，把血书交给了他，并让他转交党中央和毛主席。赵如璋眉头一皱，似乎有所感动，收下了我的血书，安慰了我几句，把血书交给了身边一位仪态大方的女军代表。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女军人正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孔令华的爱人李敏。她当时是工作组的秘书。

我的万言书大字报和写血书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院。许多干部、教师、同学纷纷到宿舍来看望我，并写大字报对我表示支持和声援。一些已有分歧的高干子弟也来看望我，甚至有许多不认识的女同学也多次来找我，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当时，支持我的同班同学中，尹聚平是最坚决的一个。在我挨整的日子里，她始终同情我，支持我，为此，她也被工作组列入黑名单中，被点名批判，可她似乎并不很在乎。她不善言辞，一遇批判就用沉默寡言来抵挡。

说实在话，尹聚平完全应该当“保守派”。作为干部子女，她的父母当时也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但作为烈士的后代，她象我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积极投入了运动。我当时认为，象我们这种人，不可能也不甘心当逍遥派。我们的命运始终同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若资本主义“复了辟”，反革命上了台，我们也要跟着人头落地，不象有些人，蒋介石来了照样有饭吃。因此，对于某些所谓“胆小怕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实人”和“逍遥派”我很有看法和意见。

当时，尹聚平因同情、支持我而逐渐走入了造反队伍，成了“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后来身不由己地介入了某些重大事件，受了很大地牵连和磨难，差点丢了小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连累了她，害了她。她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二个女性，她后来水到渠成地或者说阴错阳差地成了我的患难妻子，但当时，我俩毫无特殊之处，仍是普通同学关系，因为我当时有自己的女友李青君。

据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之所以同情、支持我，完全是因为烈士后代，同病相怜而已，她根本没同我谈过恋爱，更没想到后来会嫁给我。就算如此吧！她当时刚20岁，天真无邪，可能什么也没有考虑，她也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李青君在等着我。

◇ 工作组走了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报指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毛泽东8月5日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死刑。毛泽东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负责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 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该大字报全文于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5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但有关内容当时就传播开来。不久，便传来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撤走的消息。被工作组整过和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和教职工们欣喜若狂，学院里又一次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许多大字报要求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为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一小撮”的师生们平反。这时，工作组指定了以孔令华为首的北航文革筹委会，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而工作组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一天，石兴国、我和其他几个被工作组整得较厉害的学生（所谓北航十大“牛鬼蛇神”）被接替工作组的文化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楼开会。那天，北航戒备森严，不一会儿，几辆高级军队轿车开进了北航。

国防科委的钟赤兵中将、罗舜初中将、刘华清中将、陆杨少将等领导来到了会议室，“召见”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牛鬼蛇神”的我们。会场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如临大敌。钟赤兵等领导大发雷霆，他百般为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撑腰、辩护，一口咬定我们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让我们好好检讨，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真是杀气腾腾。

钟赤兵将军是老革命，他在长征中娄山关战役时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因没条件，锯掉了。他是我军有名的独腿将军，打仗时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这些当时我们都知道，但他同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对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很不理解。

工作组要撤走了，把许多干部学生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工作组没有一句交待就要走了，把烂摊子留给了以孔令华为首的文革筹委会。我们认为：工作组不能走，筹委会是工作组指定的，我们不承认，它也解决不了北航的问题。于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教师亮起了真正的红灯。许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红灯笼，挂了出来；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们——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员、司机、某些教师和高干子女们却挂起了绿灯笼，为工作组放行。“红灯”派和“绿灯”派互相冲突了起来。保工作组的人挂出了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工作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组万岁！”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就这样离开了北航。

□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

~~~~~  
【难忘岁月】

走进文革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有关章节，作者在文革开始时为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班学生，后来成为该校以及安徽省学生造反派的一号领导人。）

### 第三章 隔窗也闻风雨声

为了贯彻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思想，我们六六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不是由老师出题目，学生按照题目做文章，而是到设计现场或生产现场，“真刀真枪”地搞设计，将书本知识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

一九六五年冬，我和姚承慧同学，带十个同学分两组，到上海市计量局和上海录音器材厂搞毕业设计。两组由我总负责，姚承慧协助，还为我们配一位辅导老师。我们小组一行五人，都在上海市计量局。课题是：某种坐标镗床用的鉴定标尺。由于精度特别高，对标尺长度必须用氦氖激光的波长来鉴定。这是一项军工科研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工作的上海市计量局是在长乐路，但我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单身教师住的小红楼里。每天上下班都要挤48路公交车，两头还要走一站，正值隆冬，确实辛苦。后来发现，乘车用的时间比慢跑上班省不了多少。我们干脆不乘车，每天早晨跑步上班，这样既可以给学校节省交通费，又锻炼了身体。除非是下雪或下大雨，我们总是坚持跑步上班，我们一直坚持到离开上海。

由于我们的住地和工作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变化都很敏感，一到上海就听到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有议论。我没有《文汇报》，以后买了单行本翻一下，只是感到姚的文章写得很好，文笔很锋利，没有太往别处想。加上上班很辛苦，班上又要翻资料，参加课题论证，有时晚上还得加班，的确没有空余的时间想别的。同时我还要准备三月份的研究生考试。晚上再迟回来也得看看专业书和外语。忙碌，使我这个组长忘掉了小组成员的政治思想学习，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架势。但天底下的事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我不想管“窗外事”，但窗外事要管我。到了六六年的四月份在报刊上批判吴晗、翦伯赞的文章越来越多。作为地方组织并未组织大家学习，有兴趣者多看看，无兴趣者少看看。作为我们这些外地来搞毕业设计的学生，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时研究生考试已经过去近月，总体设计方案已经论证完毕，只等局当权者同复旦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机床厂等有关单位会同审定，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整体方案中的电子线路部份细化。因为整体设计没有批准，我们也只是准备而已，相对时间空闲，在局里除翻阅技术杂志外，也可多看些报纸，同时也可与局技术人员说些别的。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有关信息知道的要多一些，加上我们住的宿舍对面就住了一个安徽徽州老乡。他因生病，休学留校养病。他对时政很关心，经常到我们宿舍闲扯。这样，零星的信息在我的大脑里像细雨般地渗透起来，也越来越证实我几年前的感觉是对的。但由于我们在地搞毕业设计，再有几个月就是毕业分配，头脑里考虑更多的是今后到那里？自己该怎么办？再加上对旧友的思恋，尽管当时的形势已是风雨乍起，声满沪城，但在我的心灵深处并未激起太多的共鸣。

到了六六年的五、六月份，文化革命的暴风雨真正来临。五月中旬全面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这时已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必须服务党的需要。当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三家村”；就是要愤怒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就是要批反动学术权威……。我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只有无条件服从，而把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因此，上海计量局组织的大小批判会、声讨会我们都是参加的，而且还发过言，这就是所谓人在风雨中，不能不闻声。这时的交通大学也变得很不平静，除掉按中央的调子批了“三家村”、《燕山夜话》外，也还有交大自己的特色产品，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如果说五月份是风雨乍起的话，六月份就是暴风雨来临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一出，上海交大沸腾了，特别是六月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后，更是风起云涌。但交大的风向有所转变，“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少了，校党委的大字报多了。这时似乎学生已停课，看不到学生上课，都在校园里忙忙碌碌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抄大字报，还有三五成群辩论的。我们将对面宿舍的小老乡请过来问情况，小老乡告诉我们：“上海交大有教授资格的是67人，现在被点名上大字报已经有63人，还有4人不知是什么原因没上大字报。学生、老师有多少，没有去统计”。当时上海计量局虽然也有个别人的大字报，但毕竟无碍大局。我们的设计工作已经处于半停顿状态，人心开始浮动了，两个设计组的同学，也时不时问我怎么办，我的回答只能是：“等学校通知”。其实，我的内心也是动荡不安。六月上旬，我们的设计方案基本就绪。白天，局里会议多，只好晚上做实验。这时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已是热火朝天，设计组的同学再也按捺不住了，老是问我怎么办？我和辅导老师及姚承惠商量一下，决定先给学校发个电报，请示在外地的毕业生要不要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安徽的文革开展滞后，一直到六月十日左右才给我们复电：要求我们立即返校。在此期间，我作为一名正式党员，必须带党的临时关系，以便参加当地党的组织生活。大约在六月七点左右，上海市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动员文化大革命，同时宣布文革中的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上海计量局作为市府机关，党员都安排在主会场，就是当时的工业展览馆（原中苏友好大厦），会议由市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市长曹荻秋讲话。我当时最关心的是政策，因为我对上海交大搞了那么多的“反动学术权威”就很想不通，哪会有这么多的坏人？更何况还搞了许多普通教师和学生。我就想知道上海市委对这一问题如何看，所以我对上海市委的有关政策记得特别清。正是我记清了上海市委有关文化大革命政策和规定，并把它带回了合工大无线电系六届党支部，这些政策都成了我引火烧身的火种。

我们接到学校要我们立即返校的复电后，连实验数据都未来得及整理交掉，就匆忙打点行装往学校奔。大约是六月十二、三日的下午一点左右，我们一行十人踏进合工大的北大门。一进大门，我就看到工大主楼上贴满了学生的大标语，其中有两幅就是我们班同学的。我看到这些大标语的反应首先是吃惊，接着是反感。上海交大在市委文件传达后，老师和学生的大学报立即被覆盖，零零星星出现了校领导的大字报，而大字报内容多半是批评和建议性的，为什么工大还在搞学生和老师呢？难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吗？又是对工大做法的不理解，把我推到了风口上。当天下午我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在校园内各处看一看，我居然发现在3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墙壁上还有团支部书记的大标语，要她交待与大学阔×××的黑关系。说来也巧，当天晚上，团支部书记就到宿舍找我，想和我好好谈谈。我们一起走到西操场，在一支篮球架下坐定。她真是未曾开口泪先流。见此景，我说：“你先哭吧，哭出来心里好受些”。她说：“我哭不完，我们就这样说。这么多年来，你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我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是先要向你汇报的。你也比我大些，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兄长。我和某某的关系是清白的，以前我也向你谈过，你是知道的。现在非要让我交待同他的‘黑关系’，我们之间哪有什么‘黑关系’？党内党外压力这么大，这是校党委，党支部布置‘抓黑点’，‘摸黑线’，搞的到处都有我的大标语……”。其实她一直是抽泣着向我哭诉，当她讲道：“我是个女孩子，这样以后我怎么见人……”，她讲到这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真的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心被她的哭声震撼着，儿时那种好打抱不平的性情，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我一定要找机会为她讨个公道。

机会很快就来了。大约是六月十三号，年级党支部因为我和姚承慧刚从上海回来，对学校 and 系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了解。开个支部大会，一方面向我们传达校党委“抓黑点”，“摸黑线”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也想听听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会议是由党支部书记宋某某主持的。这是个老实人，没说几句话，后由年级辅导员丁某某介绍情况，并要求党支部要继续按照校党委的指示精神，在师生中“抓黑点”、“摸黑线”，搞摸底排队。最后，丁某某一定要我和姚承慧介绍上海交大的情况。开始，我要姚先讲，姚推辞说：“我不行，我们小组（设计小组）在郊区，又是工厂，对文革情况知道不多，不象老梁他们组。他们住在交大，工作在计量局，都



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文化革命搞得比较热闹，情况比我多。我们工厂不行，搞的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再说，我的表达能力（姚有点口吃）也不如老梁，请他先讲。”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汇报。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讲几句真话，也是心里话。

我开始从表面上介绍交大和上海计量局的文革情况：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当天晚上，我们又从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出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不仅全文转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且加了按语。一时间，上海交大沸腾了，打起了横炮，掀起了老师、学生之间互相斗争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上海市委紧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自从上海市委宣布了几条政策以后，不知为什么，运动朝着纵向发展，矛头主要对着党委。一夜之间，老师、学生的大字报不见了。这时听说市委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紧接着我就传达上海市委的文件精神，运动的重点还是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问题，这是大方向。对老师、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准整，即使个别人有问题也要留在运动后期再处理。我回来后，各处看了看，到处都有“黑点”、“黑线”的大字报、大标语，与上海交大初期一个样，不知道是不是全国各地没有统一的政策，各搞各的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接着我对“黑点”、“黑线”问题大发议论：大家知道，我们工大教职员加起来上万人。在这么大的人群中，有几个“黑点”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抓一抓也是必要的。但在群众中摸“黑线”，我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是学过数学的，线是什么？线是无数个点的集合，点连成线，数量就难于控制，容易搞成扩大化。这与上海市委的精神完全不符。谈到这里我把话锋一转，说到抓“黑线”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班原来的班长朱某某，他身上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例如他看不起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在学习上他也缺少对这些同学的帮助，他接触的同学中，多半也是剥削家庭出身的，存在白专道路的思想。这些问题一九六四年，我和他做过长时间的交谈。他也承认自己身上的这些不足，并表示今后向党组织靠拢，多与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接触，增加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久后，他还向我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整理的谈话记录现在还完整的保留着）。他怎么一下就变成反动的大“学阀”了？并且还要从他身上摸黑线。这样把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汪某某也摸进去了，她是一位女同学。大字报，大标语一贴，要她交待与朱某某的黑关系，以后她怎么过？我的话越说越激动，坐在我身边的姚承慧用手拉拉我，意思叫我不要再说了。没想到我的调门更高了：我认为我们年级已经出现扩大化，本来可以和风细雨地批评教育同学，一下子就把人家推到坏人一边，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在同学中摸“黑线”的做法，停止继续扩大化。我觉得我为同学说了公道话，说了真话，没想到就是真话成了一把烈火，一夜之间烧到了我的身上。

当天晚上大约十二点左右，同班的李道舒同学把我喊起来，告诉我二专业（电真空专业）一部分同学准备连夜贴你的大字报，听说这种事丁某某也知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谢谢你的提醒。请你放心，不过我不怕，我不相信安徽和上海不是一个共产党”。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班上几个同学气喘嘘嘘地告诉我：3号楼下面的路边上摆满了你的大字报（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大字报栏，只好平摊在路边上，用砖块压起来），有些话很不好听，你要经得住。3号楼和5号楼之间只隔一条马路，5号楼就是女生宿舍。我们无线电系的男生住在3号楼，2号楼是单身教师，6号楼、8号楼的几个系的同学到教学楼区，那是必经之路。我还没有被打上红XX名字的大字报就摆满了那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内容基本都是些工作中的问题。最让我不能容忍，也是最刺痛我的心的是，有一份大字报，竟然用一些，“谈笑风生”，“拥抱接吻”的语言，指名道姓地点出了我和原来女友的恋爱过程。后来我听说，他们就是想用这种所谓桃色事件搞臭我。当时我真怕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又不好直接安慰她（因为我要信守对党总支的保证），我只能侧面向我们班的女同学，打听XXX情绪怎么样？回答是：开始是很气愤，但很快就好了。这话无疑是对我极大的安慰。还有一份大字报就是“看西瓜皮司令——梁守福的嘴脸”。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看来是存在阶级感情问题的。因为“西瓜皮司令”本来是出自国民党军队一名副官之口，这一点被无线电技术专业（简称一专业）的同学抓住了。三个班的同学几乎不约而同地要准备向二专业部分同学的大字报进行还击。无线电系

的学生内战一触即发。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六月十四号刚进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指示系工作组组长，先做我的工作，最好由我说服一专业的同学不能反击，校工作组马上采取措施。果然不错，当天下午，校工作组组长马维民就召开了全校党员和学生干部大会。会上指出，无线电系出现的大字报是错误的，不能用阶级敌人的话骂自己的同志。肯定了我和一专业的同学是顾全大局的，避免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内战。会上同时宣布了省委与上海市委类似的政策。

学生、老师的内战刚一结束，斗争的矛头指向校党委。从对校党委揭发的大字报中知道：六月上旬工大发生学生斗学生，老师斗老师，学生斗老师的混乱局面是校党委一手造成的。五月二十二日，学校党委副书记陶某，在校党委常委会上指出 21 个“黑线”人物，还有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黑单位”。

六月三日，也就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与《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之后，校党委决定了“黑线人物”名单并上报省委。到六月四日，正式向全校抛出了“黑线人物”。学校里的“摸黑线人物”的斗争从此正式开始。五天内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教师共 140 人，占学校教师总数的 19.2%。陶某在会上又说：“要把学生中挖好的黑线抛出去”，“把靶子交给群众”。

六月七日，根据校党委的要求，各总支对 6 个学生，6 个工人，9 个一般干部，25 个助教，29 个教师，15 个教授整理出了系统的“材料”，并用大字报向全校师生公布。此时，全校被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数共有 97 个。

在校党委的示范作用下，全校掀起了“横扫”的高潮。主要是以大字报的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仅六月十一日上午半天，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达 87 人，其中学生 48 人，工人 19 人，教师 9 人，一般干部 11 人。学校已搞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到了今天我贴你的大字报，是积极分子，明天一觉醒来，可能又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有的大字报中写上：“欢迎大家揭发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向我这个牛鬼蛇神猛烈开火”等等。

有一个班，全班共有 32 名同学联名贴出《投降书》。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反革命集团”、“裴多芬俱乐部”，成批的“牛鬼蛇神”、“右派”、“黑帮”都出现了。

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六七届挖出了以戴某为首的“篡党”、“篡政”、“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

机械铸工教研室“破获”了一个大型的“反党集团—裴多芬俱乐部”，规模之大，竟涉及到七个教研室，两个系和一个实习工厂。由原来一个人迅速株连到二十多人。这个“反党集团”的“反党”材料已由校党委上报公安部门备案。

机械系当时在校学生 830 人，被大字报点名的有 150 人，其中被扣上“黑帮分子”帽子的 85 人，占 10%。

从六月四日校党委创“黑线”开始到六月十四日工作组进校的十天内，被揭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 447 人，占全校总人数的 7%。其中：教师 159 人，占教师总人数的 21.9%；干部 47 人，占干部人数的 12.3%；工人 53 人，占工人总人数的 14.1%；学生 176 人，占学生总人数 5.5%。这就是我在揭发校党委陶某的大字报上看到他十日内在全校取得的“战果”。

此一时，彼一时。省委派来的工作组结束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混战。学校混战的气氛很快

冷清下来，但内火仍在燃烧，那就是揭发校党委。一时间校党委的内部“材料”，也可以以大字报的形式公诸于众。这些材料主要是来自校党委的内部。代理书记赵某某、副书记陶某、校长刘某均未幸免。工大的党委职能被工作组代替了。但工大被揪出来的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公开作过检查，但没有人被戴上高帽子游校园，更没有谁挨打或罚跪，体现出“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由于我认为工作组进校后，结束了群众间的混战，火烧到校党委符合上海市委宣布的政策，再加上自己又是毕业班，对工作组的工作并不关心。虽然到了七月初，校内也有批评工作组的声音。由于我经常同几位同学下乡劳动，对校内的风向反应迟钝。没想到七月中旬风向突变，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一下多了起来，围绕工作组的辩论开始了。

形势难测，瞬息万变。也许是我消息不灵通，也许是我并不很关心，也许是我变得木讷。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在北京已开始赶工作组，有的学校居然将工作组赶走了。但我还一直认为工作组在工大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所以，在评价工作组功过是非的问题上，我是站在工作组一边的。因此，在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中，我写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评价工作组的功过是非”的长篇大字报，极力为工作组辩护。主旨是：工作组进校后，结束了学生，老师之间的互相混战，保护了一大批老师和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校党委的几个少数人，这就避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悲剧发生，这是符合毛泽东一贯思想的，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由于这张大字报理论性较强，同学们没有兴趣，也没引起什么反响。特别是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作了公开检讨，承认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恩来对派工作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检讨。这次会议是以广播的形式，向全国现场转播的。工大组织学生进行了收听，我觉得自己落后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很不合时宜。特别是《十六条》发表后，感到是老调重弹，只是早已宣布过的政策，用中央决议重说一遍，所以在心中并未点起激情的火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工作组的情绪越来越高，要求省委一定让以马维民为首的工作组向全校师生作检讨，否则马维民等必须回工大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马维民为首的工作组，在工大师生一片喊“打”声中，于八月四日悄然离去。但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不能处于真空，随后又来了以李振东为首的“观察组”、“联络组”，他们继续行使校党委的职权。我对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局面，实在不感兴趣。就在工作组撤走后，工大校园里出现了以电机系总支书记杨素清等人的大字报，标题是：“是谁扑灭了工大的四清烈火？”其矛头所向是对省委的。因为我当时认为，从大字报涉及的内容来看有来头，所以印象很深。我这个保工作组的老保分子，并没有受到工作组问题的更多株连，只是逍遥而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中央下通知，六六届毕业生推迟一年分配，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想分配后离开学校的念头彻底打消了，而且推迟分配期间不发工资。于是家里还得继续支持我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本来经济就比较困难的我，无疑是雪上加霜。有什么办法，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只有服从。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就有些不理解、不热心的我，变得更加不积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合工大东操场架起了临时舞台，是为马维民作检讨做准备的。为了开好这次大会，省委很重视，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省委书记处书记任质斌，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三位省委主要领导人，下午三点就到了工大。开始是看学校的大字报，晚上八点参加马维民的检讨大会。谁也没想到，同学们对工作组的检讨已经没兴趣，不要马维民作检讨，而是要李葆华直接回答安徽省的问题。其中最集中的是：省委为什么封锁毛主席关于学生大串联的消息？造成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安徽没有几个人，工大没有一个人参加。这个问题，李葆华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结果机械系六八届的一批学生，强烈要求省委立即同意工大学生到北京串联。三位书记就在主席台上，临时商量一下，决定工大同学从今晚起，在校文革的统一组织下，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这对当时还封闭在校园内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爆炸性的好消息。参加会议的同学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一哄而散。我们

班的同学也不例外，回到宿舍，经自愿报名，我决定暂不去北京，留下护校。这样工大近五千名学生到二十六日，学校剩下的学生不过千人，这批人多为党员和学生干部。就是这批不过千人的学生，却掀起了安徽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

□ 摘自梁守福：《乱流浮沉半生缘》

~~~~~

【史海钩沉】

## 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与北上告状

• 何 蜀 •

重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秋，相继发生了三次影响较大的造反派上京告状事件：9月上旬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大专院校造反派师生上京告状，9月下旬中学生红卫兵总部上京告状，10月中旬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前两次事件当时在传单、小报上都有较多的文字记载（如大学生写的《八一五史话》，中学生写的《难忘九月天》等）。而对后一次工人造反军的北上告状，笔者目前见到的文字记载极少。

所幸的是，笔者于2007年3月间在发表于互联网上的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戴维堤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意外见到了朱进选（朱东）这个名字。笔者早已知道朱进选是当年参与组建重庆工人造反军和筹划北上告状的关键人物，便通过北京的朋友帮忙，与朱进选先生取得了联系，朱先生不但口述提供了许多记忆资料，还寄来了当年他从贵阳到重庆的火车票、他在组建重庆工人造反军时亲手制作的第一批纸质胸章（包括纠察胸章）、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前后他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的两份电报的底稿及他起草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北上宣言》传单等难得的历史资料复印件。再加上笔者对当年参加北上告状的朱登明、甘廷荣、朱镇坤、林嘉禾、杨国成等的采访和2008年5月27日与朱登明、甘廷荣、杨国成三人的座谈，总算对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和北上告状事件有了一个大体清晰的了解。

1966年8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大门外开始出现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8月22日，市委为竭力维持稳定，向各地区各单位社教工作团、工作组秘密发出四条指示，主要精神是不准到市委看大字报。但这一指示有如禁书令一般起到的是相反的广告和诱导作用，民众纷纷不顾禁令前去市委门外看大字报。

位于市委大门对面的重庆市第六中学，干部子弟众多，信息来源广，造反精神强，造反派学生迅速占了上风，控制了学校局面，六中便成为到市委门外看大字报的造反派群众串连活动的最佳落脚点，也成了工人造反派组织筹建时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邻近六中的人民小学，当时设有外地赴渝师生接待站，这也使造反派与外地红卫兵建立联系有了便利条件。

最先在六中与造反派工人联系的，有首都红卫兵一司成员、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孟宪臣（后为首都一司驻渝联络站负责人）。这时到六中来串连的工人，主要是一些在本单位遭到工作组批判打击的青年工人。他们不愿被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认为北京来的红卫兵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把申冤、平反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学生身上。北京学生们谈起的首都“文革”情况，使工人们瞠目结舌，眼界大开，他们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又一场“反右派”运动，无不欢欣鼓舞，勇气倍增。这时，一些单位已经开始出现自发的工人战斗队、工人造反军之类仿效红卫兵的群众组织。

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市经委主任马力在一份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根据（工交）

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1〕

另据重庆市委基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回忆，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的造反派组织是在9月25日以前就建立起来的。〔2〕

9月23日晚，北京航空学院有翼导弹控制与装置专业二年级学生朱进选等三人从贵阳乘火车到重庆，先到了重庆大学。9月25日，朱进选等进城到重庆六中，参加了组织工人造反派的工作。当朱进选他们从重大出来时，在沙坪坝街上碰到一个赞同八一五观点的青年工人正被人围攻，朱进选等以首都红卫兵的身份去帮那个青年工人解了围。青年工人叫黄全达，是长江航道段661指挥部的临时工，此后他就一直跟着朱进选参加活动，是工人造反军和北上告状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以后在1967年黄全达随朱进选去河南参加组织“工农共产主义运动团”，与朱进选一起被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主犯，在秦城监狱关押多年）。

朱进选到六中后，为前来串连的造反派工人设计印制（油印）了登记表格，包括每人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他看到各单位工人群众组织名目纷繁，有的叫造反军，有的叫造反团，有的叫战斗团，就提议把名称统一起来，并且给他们起了一个因力求多一些“革命”元素而略显冗长的名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他还亲自设计和刻印（油印）了第一批工人造反军的纸质胸章，在上面刻绘了象征共产党领导的党徽（镰刀斧头）和四射的光芒，交给六中学生用红纸印好，贴在纸板上，做成一个个小纸牌子，他亲手写上编号“革字×××号”；另外还做了十来个“纠察”胸章，在背后加盖了“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印章，找了些踏实肯干的工人担任纠察，主要做维持秩序、防止发生破坏的保安工作。

9月30日，因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学生决定次日独立组团参加国庆游行，朱进选认为工人造反军也应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名号公开打出去，就用红纸写了一幅竖条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名牌，贴到重庆六中校门边。同时，他又起草了一份宣告工人造反军成立的《告全市人民书》，交六中学生帮忙油印出来。

当天，由孟宪臣等北京学生组织，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大会由杨国成（重庆市建工局402工区工人，中共预备党员，复员军人）主持。说是大会，其实规模并不大，到会的工人不多，更多的是前来助威的学生。但总算是宣告了工人造反军的正式成立。

“文革”风暴已经让市委领导人六神无主，穷于应付，只想防止群众性的动乱进一步蔓延，因此听说“八一五派”（造反派）要独立组团参加游行，市委便提前通知各单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等抢先占据游行必经的主干道。10月1日上午，重庆市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但这次游行与往年不同的是，再没有往年那样提前彩排、展示各行业建设成就的盛装游行队伍，而只有绿军装、红袖章（主要是由市委“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的袖章）、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牌和红旗。

据当年造反派学生重庆市六中钢鞭战斗队增补翻印的大事记记载：

九月二十八日

当我们知道国庆游行市委不让“八·一五”派以独立的支队游行时，“八·一五”派革命同志无不愤怒，立即发出呼吁，提出强烈抗议。为此，北京来渝同学走访了“重庆市国庆游行筹备委员会”，他们答应“解决”这个问题。

九月三十日

市委一反常态，晚11时45分，在市委的指使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纠察队及有关单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游行位置，说什么“八·一五”国庆节要闹事，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十月一日

……几万“八·一五”派的革命学生未到主席台，他们就匆忙宣布“大会游行结束”，匆匆溜走。“八·一五”派战士高举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打着革命的大字报、土制油印机，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3）

工人造反军的队伍是从六中出发参加游行的，然而在六中学生编写的这个大事记中却没有关于工人造反军参加游行的记载，可见当时工人造反军参加游行的人数很少，也还没有正式的旗帜、袖章等标志，因而尚未引起注意。他们少数人员只是跟在学生队伍后面或与学生队伍混在一起，举着一些写有革命口号的三角小纸旗，沿途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等口号，一直游行到了朝天门。

1966年国庆节后，形势有了极大变化。国庆节发表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10月5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为了进一步把群众“运动”起来，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全国。重庆市委也不得不发出了（66）171、172号通知，要求各单位搞好平反工作，并支持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的平反监察委员会开展工作。这个平反监察委员会由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和中学生红卫兵曾维才（建材学校学生）具体负责，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周炳林与之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造反军等造反派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0月7日，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编印上报市委、市文革办公室的《情况反映》第73期《关于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反映》中称：“最近几天，我们对‘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据工交口五十七个单位初步掌握，参加‘革命工人造反军’的约有1279人，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已退出这个组织的有805人。”（4）

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市委对工人造反派施加了较大的压力。另外，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市经委主任马力在一份材料中还谈到他曾布置驻二印厂工作组用经委的吉普车到六中附近把二印厂一个常去六中参加造反军活动的勤杂工抓回厂里审问，驻三轮车社工作组把造反军成员张政等人关起来批斗、围攻，逼迫交出造反军的“联络代号”，把造反军的活动打成反革命活动等。（5）

聚集在六中的造反派工人，受到《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鼓舞，在造反派学生的鼓动下，上百名工人造反派于10月11日晚上进驻市委大饭厅，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解决问题。此前，由黄全达等工人与北京学生们一道拟定了向市委提出的四条要求：

- 1、承认工人造反军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 2、给工人造反军安排办公地点；
- 3、给工人造反军拨发活动经费；
- 4、因受到工作组迫害而逃离单位、被扣发工资的工人，应该补发工资。

市委对这样的要求当然不可能轻易表态。12日早上，急不可待的北航学生朱进选以“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去了一份电报，内称：“向党中央、毛主席告急：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现已成立，在市委请愿，声讨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达八小时之久了。市委领导人怕字当头，不接见我们，我们坚决要求改组重庆市委。”“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市委不承认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我们坚决不离开市委！速回电指示。”

12日深夜（13日凌晨）3点10分，市委派出一位书记处书记（据杨国成回忆是辛易之）出来见了工人们，讲了些安抚、劝导性的话。但工人们对这些空话并不买账，执意要求答复四条要求。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10月13日晚，眼看工人造反派的要求难于得到市委同意，孟宪臣、朱进选等首都红卫兵商量决定：让工人造反派人员撤出市委，步行北上告状。朱进选起草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北上宣言》，由六中学生印成传单，《宣言》说：

“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鉴于重庆的严重情况，为了捍卫十六条，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工人被害、被扣、被软禁、失去人身自由的一切革命同志，揪出、斗倒、斗臭、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于十一号晚召开紧急会议，控诉市委严重违背和极端仇视、歪曲、破坏、对抗十六条的严重罪行，会后去市委解决问题，但市委用尽破坏之能事，市委一手控制的市文革——市委镇压、破坏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打手，六十年代的绞杀革命的白公馆，进行百般刁难，于十二号晚三点半一位书记出来‘接见’，此位书记完全暴露了市委的丑恶嘴脸。……我们要亲自去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向毛主席汇报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最相信党中央，最相信毛主席，我们只能相信党中央，只能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救星，是我们心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10月14日，在市委大饭厅静坐请愿的工人造反派全部撤回六中，得知要北上告状后，愿意参加者即各自回家准备钱和粮票（市中区建筑联社的工人造反派是由老工人出面向工会借支了当月工资）。本来决定年纪较大、有家庭拖累的老工人不参加北上告状，但是许多老工人都坚决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以往“见毛主席”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和政治待遇，必须由各级领导选拔、审批。而这时自己就可以有此选择机会，何乐而不为？

孟宪臣、朱进选等北京学生召集各区工人造反派中的骨干人员开会，研究了北上计划，并把参加北上告状的工人按地区编成了六个连，指定了负责的连长、指导员。分别是：

一连：连长朱登明（重庆市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施工员，26岁），指导员黄万奇（杨家坪弹花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一连人员以重庆市市中区建筑联社工人为主。

二连：连长王文学（重庆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复转军人），指导员罗某（重庆市供电公司工人，复转军人），人员以沙坪坝区工人为主。

三连：连长甘廷荣（重庆市工农兵服装厂工人，20岁），指导员白某（女，中共党员）。二连人员以南岸区工人为主，包括工农兵服装厂、重庆卷烟厂、红卫纺织厂、南岸区建筑公司等单位。

四连：连长胡崇金（重庆市建工局402工区工人，共青团支部书记），指导员不详。人员以江北区的重庆市建工局402工区和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为主。

五连：连长林嘉禾（重庆钢铁公司五厂工人，共青团员，28岁），指导员不详，人员以大渡口区工人为主。

六连：连长张廷贵（重庆市矿渣水泥厂工人），指导员李显鑫（杨家坪无线电修理部工人，共青团员）。人员以九龙坡区和北碚区工人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纠察班，班长邓胜利（东方红模具厂工人，退伍军人）。

北上告状团领队先后是杨国成和叶祖禄（重庆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复员军人，20岁）。

从这个名单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这批工人造反派有几个特点：青年工人多，流动性大的建筑行业工人多，中小企业工人多。除个别人家庭出身“不好”外（一连连长朱登明是“反动官僚”出身，其父曾任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川北行署主任），大多是“根红苗正”，接受“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而且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还有不少刚从人民解放军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造反呢？从几个人的遭遇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连连长朱登明，1966年8月15日重庆大学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两派学生对立冲突的“八一五”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现场率领施工队为重庆师专图书馆大楼进行大修。因他和工人们为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事后重大八一五学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全城围攻时，他又代表所在建筑修缮社的十六个老工人写了为学生辩诬的大字报《为重大八一五疾呼不平》，被区委工作组定为重点清查、打击对象，他在重大学生帮助下逃离单位，先到重大，后到六中，参加了工人造反军的筹建。

三连连长甘廷荣，因为反对市委的“四条”（不准到市委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辩论等），得罪了厂党总支。那时刚学习了“十六条”，在一次会上，总支书记宣布市委规定的“四条”，他起来发言，说这“四条”是错的，不准职工去看大字报是违反“十六条”精神的。这就使他成了党总支心目中的有问题人员。随后他又违反“禁令”跑去市委看了大字报，还到重大去找了学生串连，回来后又参与组织了厂里的第一个群众组织青年革命战斗队（单位上全体青年参加，共青团支部书记任队长）。9月21日，市委财贸政治部搞了一次统一行动，把全市财贸系统各单位有“造反”言行的人员全部关起来。甘廷荣被关到国庆节过后，借上厕所之机逃走，由第十一中学和交通学院学生帮助逃到了六中。

北上告状团前期领队杨国成，“文革”前刚从部队复员，其中共党员预备期应到1966年10月结束，他本来在单位上参加搞“四清”，因读报读到“工农兵是文化革命主力军”时发了句牢骚，说“大字报都不准我们看，还算什么主力军”，被工作组当作批判对象，被迫起来造反。

四连骨干朱镇坤（重庆市建工局402工区工人，共青团员，21岁），原在单位上是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四清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培养重点，正准备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但是在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围攻外地来渝串连的学生时，他看到热情单纯的学生们遭到有组织的围攻，不让吃饭、喝水，甚至不让上厕所，有的女生被逼得小便失禁。他实在看不下去，就给工作组提了意见，被工作组认为“立场有问题”，一下子就从依靠、培养对象变成了打击对象。出于义愤，他就参加了造反。

五连连长林嘉禾，在厂里率先成立了闯将战斗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批判后单独关押，他进行了绝食抗议。工作组被迫将他放出后，他于10月12日跑到六中，参加了北上告状。

从他们的经历可知，当时这些工人造反派，大多是被基层党委或工作组按照“反右派”运动的老一套思路打击迫害而“逼上梁山”起来造反的。



这批人当中，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即一连指导员黄万奇，他是个转业军人（据说是正连级干部），中共支部书记。后来一连连长朱登明和一些工人曾好奇地问过他：你又没有受过迫害，为什么要参加造反？他很老实地回答说，他本来是被党组织派来打入造反派的（因为他是九龙坡区杨家坪那边的人，市中区这边的人不认识他，所以派他来与市中区的工人造反派接近，还为他编造了“对转业后的安排不满意，受到压制”的“造反”理由）。但他到六中接触到这些造反派工人后，发现他们都是些热爱毛主席的热血青年，都是好人，没有谁是图谋不轨的“反革命”，于是就跟他们一起真正参加造反了。朱进选至今提到他还说他是个很老实的正派人。

10月15日清晨，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还有一些学生随行）从重庆六中整队出发。步行经沙坪坝翻越歌乐山北上。据甘廷荣回忆：“我们步行走到璧山，一路上艰苦得很，我记得我边走边在打瞌睡，但是想到上北京向毛主席告状，就有了干劲。”〔6〕

北航学生朱进选在北上告状团出发前作了简短讲话后，回到在六中的住房里去取东西，出来时告状团队伍已经走远，他乘车追赶又走错了路线，未能追上。他的同学许叔兴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臣等学生（还有一些重庆学生）则跟随北上告状团队伍走了。朱进选独自返回后，到市委向文革办公室人员提出：工人北上告状团已经步行出发了，市委如果不管，路上出了事市委要负责。

形势毕竟不同了，焦头烂额的重庆市委对此不敢不重视，当即派了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基建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的干部（还带上了医护人员）前去追赶告状团。当晚，市委人员赶在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之前到达璧山县，联系好县城里最大的餐厅为告状团准备了晚饭，并约见告状团代表和随行的首都红卫兵孟宪臣等，劝说他们返回重庆，有问题由市委负责解决。但告状团不同意，市委人员便按照市委此前商定的意见，提出告状团不再步行，而由市委联系重庆驻军派出军车，将告状团全部送到永川转乘火车北上。告状团工人们对此最初意见不一，有的担心这是市委的阴谋，上了车会被强行拉回重庆去关起来（有人便提出，如果那样就全体跳车，出现伤亡由市委负责）；有的不愿坐市委派的车，坚决要步行去北京，以表明自己“革命造反”的决心……最后经过劝说，加上随行的学生们做工作，告状团队伍还是全部上了市委派来的军车，当夜到永川，次日转乘火车去了北京。因北上告状团各连人数不等，有的几十人，有的上百人。估计军车出动了一二十辆。

在永川上火车后，为了在政治上不被抓住“辫子”，告状团按照“家庭出身红五类”的要求，将原领队杨国成（家庭出身小商，按当时的说法系非红五类或“灰五类”、“麻五类”）换成了叶祖禄（家庭出身雇农）。

未能走成的北航学生朱进选，在重庆六中又接待了陆续前来串连的工人造反派。他将他们组织起来，按各地区编为工人造反军的不同分团，让留守的蒋国志（国营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负责联络。随后，以蒋国志为首组建起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有蒋国志、李方成（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室干部，转业军人，28岁）、赵蔚武（重庆电表厂工人）等。因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已经日益明确，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成立后，得到了重庆市委的承认，从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工人造反军中最大的一个山头。

此后，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中以人民交通公司职工为主的二分团，脱离司令部单独活动，并成为工人造反军中坚决与重大八一五站在一起的一个独立山头，主要负责人杨大渝（人民交通公司汽车修理总厂工人，23岁）。

10月17日晚，朱进选乘火车赴京前又到重庆上清寺电信局以个人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了一份电报，内称：“重庆白色恐怖千余工人代表15号晨步行去京控诉饥寒交迫望速

派车”。

电报中说的“千余工人”略有夸张。据甘廷荣回忆，他们到北京后，他代表北上告状团去北京新市委领了八百个毛主席像章和八百个免费乘车证。因此他记得“八百”这个数字。估计北上告状团有六七百人。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到京后，分别被安排驻于煤炭部招待所和化工部招待所。朱登明领导的一连后来驻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到北航后，北航红旗还给他们发了红卫兵袖章）。

重庆市委考虑到天气转寒，北上工人都穿得很单薄，担心他们受冻生病成为自己新的“罪状”，还通知凡有人员北上的部门和单位各自派人给工人们送去寒衣。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人员被安排参加了11月3日举行的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驻北京航空学院的告状团一连人员是跟随北航红旗的队伍参加的。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引起许多工人造反派不满，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是“以生产压革命”。甘廷荣和朱镇坤代表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和其他一些地区来京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代表一起走访了人民日报社，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接见了他们，听取意见。甘廷荣和朱镇坤都发了言。

在北上告状团之前先行单独乘火车到了北京的黄廉（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采购员，转业军人，33岁），这时来到工人造反军告状团驻地，自称已经与“总理联络员”建立了联系，要大家把告状材料都交给他转交，并自荐担任工人造反军政治部主任。

这时，北上告状的工人造反军人员发生意见分歧，以朱登明为首的一连（主要是重庆市市中区建筑联社工人）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北航红旗的学生替他们开证明刻制了公章）。以后他们一直以一支队名义单独活动。

得到“毛主席接见”后，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人员回到重庆。因不愿接受蒋国志为首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领导，另外成立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叶祖禄、朱镇坤、杨国成、黄廉、林嘉禾等。以后，因黄廉年龄稍长，社会经验较多，与已经亮相造反的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关系密切，在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一二·四”事件及反对重大八一五“右倾”等活动中都有较突出的表现，成为重大八一五等组织的重点攻击目标，其名气逐渐超过了工人造反军其他年轻的“元老”。

北上告状团回重庆后，一些脱离了工人造反军的人员成为其他造反派组织的领导和骨干。如三连连长甘廷荣成为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后为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告状团二连的供电公司工人们则组成了供电八三〇战斗团，成为八一五派的骨干。

注释：

1. 马力《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印，1967年3月13日。

2. 申宁《反戈猛击，立功赎罪》，载《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编印，1967年3月1日。

3. 《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六中红卫兵32111战斗团“八一八”编印，“钢鞭”翻印。1966年10月5日（油印本）。

4. 重庆师专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烽火》报创刊号，1967年1月24日。
5. 马力《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印。
6. 《甘廷荣谈重庆文革》，甘廷荣口述，何蜀记录整理。2004年11月18日下午在甘家及其后几次电话访谈。

~~~~~

## 【抗拒遗忘】

又逢“八一八”

• 顾训中 •

看完大样，照例签下日期，才惊觉：又逢“八一八”！

我们的同龄人中，少有人不知“八一八”的。时至今日，又少有人记得“八一八”的。这不仅因为，岁月悠悠，已然时隔42年，当年意气风发的红色青少年，如今多已进入花甲之年；更是因为，“文革”运动、包括它所涉及的种种人物、事件、口号、出版物……在今日大陆统统被归入“禁区”，不得提起。

然而，发生于1966年的“八一八”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以雷霆万钧之势，改变着历史的走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抹去的！

196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终于以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公开推出了苦心酝酿已久、旨在清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官方史书惯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作为“文革”运动的开端。其实，即便是在党内，即便是那些参与这一通知起草、讨论并举手通过的许多高干，都不清楚毛多次亲自修改而发出的这一《通知》的真正目标、真实意图所在。更可笑的是，当时这一《通知》通过的中央全会，其主持者竟是毛发动这一运动欲打倒的刘少奇。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聂等人大字报的公开发表，《人民日报》为此而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让中国民众、包括那些因各种原因躲避或远离政治的人们都感觉到，中国又要出大事了！也正是在这一大字报、这篇社论的鼓动下，作为社会敏感群体的大、中学生，纷纷将矛头指向本校教师、领导。各类学校自动停课，党政组织相继瘫痪，出现了“文革”运动第一个批斗高潮。

出乎毛意料的是，由于连从中央至地方的党政军高干们都不明白这场新来的运动究竟要“革”谁的“命”，由于刘、邓还处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要害地位，或许还由于陈伯达选中的那个来自群众的“牛鬼蛇神”一词太没有确定性，“文革”运动一开始，便几乎本能地被各级党委纳入了历来打击党外和底层组织敌对分子的老式运动模式中去：照例地先行批斗社会上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以造成斗争声势；照例地组织“左派”队伍；照例地采取“引蛇出洞”策略，排摸新跳出来的“右派分子”，批了抓了一批新“反革命分子”（北师大一附中两个学生因反对工作组而被其同学、刘少奇女儿刘平平报告给刘，被刘亲自动为反革命分子而进行批斗，堪称当时年龄最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照例地派出工作组去发动、组织群众，引导运动方向（刘少奇直接指挥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其夫人王光美亲自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领导，邓小平则通过他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邓榕和工作组遥控该校的运动）；照例地布置收集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一切“照例”，使得刚刚起来的运动并没有进入毛设想的自下而上、天下大乱、批斗“走资派”的轨道，而是变得冷冷清清，被毛后来痛批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

气，又何其毒也！”

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来个再发动。这一回，他决定突破一切条条框框，来个“无法无天”，采取特殊手段，达到推开运动的目的。

他在7月中旬回到北京后，重回一线，重新掌控文革运动领导权，亲自下令撤回所有工作组。

他指使召开“北京大、中等院校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让刘、邓、周等原一线领导就派工作组问题公开作检讨，并在会议结束时突然现身，而毫不理睬在场的刘、邓。据在场人士回忆，当时刘、邓呆立台上，不知所措。这还不算，他并决定在所有机关、学校公开播放刘邓周的检讨录音。几乎一夜间，那些单位的所有人都知道，刘、邓犯了大错误！而这一“特大新闻”立即通过各种渠道传向全国。毛的这一出格举动开启了向全民公开党内高层分歧的先河。

他贵为党的“伟大领袖”，却采用了当时通行的群众向领导“造反”的方式，亲自写了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公开“炮轰”党内二把手、曾被钦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而先是向党内高干、继而传向全国，亲自揭示了他发动“文革”运动的目标。

当然，他最“无法无天”的举动还是放出了“红卫兵”这一“文革”打手，用以直接推动运动朝着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乱”局面发展。

为此，他不惜排除原有的共青团组织体系，亲自给主要由革干、革军（当时的流行语言，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组成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公开表示了对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热烈的支持”，而此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已以反学校领导、反工作组、甚至反团中央而闻名于京城校院；

为此，他下令将这些中学生写的一论、二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作为这封信的附件，一并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成员，用“革命小将”向那些“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党内高干们施压、冲击。

为此，他越过所有组织，指使其宠臣、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钓鱼台约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直接将他支持信件传达给了红卫兵们，致使“伟大领袖”对红卫兵的这一支持不脛而走，从而使红卫兵组织先在北京、后在全国的学校、机关迅即蔓延，成为群众自发组织的代名词。

或许他觉得这一切举动还远远不足以出现一种震撼，毕竟这些举动虽已打破党纪国法之常规，却都还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他需要一种直接而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天下大乱”的发动，于是有了“八一八”，有了百万革命师生参加的空前规模的群众集会。

“文革”运动因其发动者、领导者的性格所致，留下了许多诡异之处，至今无法破解。此次“八一八”大会即是一例。大会究竟是如何决策的？是何目的而召集的？百万之众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竟然迄今还是个谜。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在他的著名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仅简单地记载：“这次大会……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却没有任何文字加以说明或展开。而在已能各种回忆、记述、年谱、评论文章中，都无法找到解答。

按时下人们对某些数字的膜拜，这个大会召开的日子十分理想，堪与正在举行的京奥开幕日（08080808）媲美。“1966”象征“六六大顺”；“八一八”象征“发了还要发”！只可惜，“八一八”大会给中国民众带来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八一八”大会有两个关键词：红卫兵，革命造反。而集二者于一身的，是高居于天安门之上、俯视群众的毛泽东身穿军装、臂带红卫兵袖章的具像。军装是革命暴力的象征，袖章是革命组织的象征。毛在天安门城楼大手一挥，同样身着军装、臂带袖章的红卫兵小将立即冲杀而出，到处造反。所到之处，打砸抄烧，人仰马翻。文革十年中第一个“非正常死亡”高潮即刻出现，期间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造反组织采用各种酷刑致死的人数，至今未见确切数字。而“红色恐怖”成了连善良民众听了都恐惧万分的革命新名词，惶论成为革命造反对象的黑五类分子、反动权威、走资派……。毛所期待的“天下大乱”局面终于出现。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巨祸，由此进入高潮。

日前网上曾热议大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与“80后作家”张悦然的一段对话。王前部长批评“80后”作家们“没有昨天”、“躲避历史”；张作家则反驳说，老作家的作品和历史挂得太紧，“不得人情”，“很难看到人格独立”。不料王前部长的批评引来了一些“80后”更强烈的反弹，指称“没有一个少年能从王蒙们的智慧文本里分享到所谓真实的历史”。在王前部长褒奖有余的王朔之类作家笔下，“文革”年代恰似“阳光灿烂的日子”，即是此类“智慧文本”一例。

“80后”们说得一点也不错。回避真实的历史，正是近20多年间当政者的伟大政绩之一。给中国民众带来如此灾难的“八一八”，竟然连过来人都遗忘几尽，又如何去苛责“80后”的青年们呢？

原本，历史应从这一巨大灾难中得到某种补偿。人们理应反思，毛何以能无法无天而屡屡得逞？单纯而天真的青少年何以会一度成为毫无人性的魔兽？违背人道、人性这些普世价值、同样违背中华传统伦理的斗争哲学何以能一统天下、成为掌握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为何造成如此巨大灾难、欠下累累血债的毛，至今仍受到膜拜而不能进行清算？经历了“文革”这类人祸，中华民族怎样才能真正避免重蹈覆辙？……

不对这段历史进行清理，中国人永远难以真正直起腰杆做人！

时逢又一个“八一八”，作如此想。

是为记。

2008年8月18日写于上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